

蔣中正對1940年夏季國際危機的因應

鹿錫俊

摘 要

1940年夏季，法英兩國在歐戰劇變和日本施壓的背景下，先後封閉了中國抗日物資的主要通道，致使中國的抗日戰爭遭遇到為期3個多月的極其深刻的國際危機。本文依據《蔣中正日記》手稿本及其他相關史料，分6節考察了他對這一危機的處置過程，指出其可以概括為下述特點：（一）整體：惟以日本為敵，與日本以外的所有國家都加強友好。（二）對德：結束歐戰爆發以來的疏遠狀態，力求在維持中英美友好關係的前提下獲得改善。（三）對日：檢討和戰的利害得失，並在至少確保最低條件下試探媾和的可能性。（四）對歐戰及相關國家：克服國民政府領導層中出現的偏激情緒與極端意見，同時看到多種可能性，並相應準備多種因應措施，等局勢明朗化後再做最終決斷。文章還認為，對日本政策走向的觀察和對德、蘇、英、美相互關係發展趨勢的展望，是影響蔣中正決策的兩個關鍵，而在此二者中所反映出來的蔣的哲學思辨，則表現出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

關鍵詞：蔣中正、抗日戰爭、歐戰、1940年、外交、危機

Chiang Kai-Shek's Response towards the 1940 Summer International Crisis

Xi-Jun Lu *

Abstract

In the summer of 1940, Britain and Franc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European war blocked China's main channels to obtain strategic goods from abroad under the pressure of Japan. As a result, China, in the middle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encountered a serious international crisis lasting for three months. Based on Chiang Kai-Shek's diary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Chiang dealt with the crisis in 6 sections and concludes with the following points: (1) In general, China must take Japan as the only enemy and strengthen ties with any other country; (2) end the frosty relation with Germany after the breakout of the war in Europe and forge better relations with it while maintaining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Britain and America; (3) analyze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peace or war with Japan and seek the chance of peace with the minimum requests accepted; (4) regarding the European War and the countries involved: suppress the extremists' opinion among government's leadership, and take no side in Europe until the end. The two key factors that led to Chiang's decision are his observation of Japan's policy and his judgment of the current and future relations among Germany, USSR, Britain and America. This article also demonstrates that Chiang's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seen in th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this crisis is superior to others.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War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WWII in Europe, 1940, diplomacy, crisis

*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ito Bunka University; Visiting Scholar (2009),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蔣中正對1940年夏季國際危機的因應*

鹿錫俊**

壹、前言

1940年6月法國對德投降後，法英兩國在歐戰劇變和日本施壓的背景
下，先後封閉中國抗日物資的主要通道，致使中國的抗日戰爭遭遇到為期3
個多月的極其深刻的國際危機。關於蔣中正在這一關鍵時期的危機處理，一
些相關論著已有所涉及，¹ 但總體上尚缺乏綜合性、專題性的研究。本文的
目的，是依據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珍藏的《蔣中正日記》手稿本及其他相
關史料，以蔣中正此期在對德、對日政策上的重新抉擇為中心，對這一課題
再作一番考察。

貳、危機初臨時刻的思考

1940年4月之前，歐戰尚處於所謂「假戰」時期。是時，蔣中正對國
際形勢的發展忽憂忽喜，但在總體上則似乎尚算放心。4月1日，他在第一

* 本文是筆者作為2009年度訪問學者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讀《蔣中正日記》
及相關檔案的成果之一，初稿曾在大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其後經過多次
修改。值此正式發表之際，謹向兩位匿名審查人、郭岱君、宋曹俐璇、房澤穎、
林孝庭等胡佛的師友及在研討會上參與評論的學者們和兩位匿名審查人致以衷
心的謝意。

收稿日期：2011年6月1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年8月15日。

** 鹿錫俊，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2009
年度訪問學者。

¹ 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一、二冊（香港：三
聯書店有限公司，2008年、2010年）；左雙文，〈轉向聯德，還是繼續親英美？〉，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鹿錫俊，〈國民政府對歐戰及結盟問題的應對〉，
《歷史研究》，2008年第5期。

屆國民參政會第五次大會閉幕辭中指出：歐戰後歐美各國對我道義上物質上的援助在這半年只有增加，美 2000 萬貸款的成立，使我無限感奮；蘇芬戰事時，似乎國際局勢更加複雜，現在蘇芬復和，歐戰範圍因之縮小，蘇聯與英美法諸國的關係不難日趨接近。²

蔣中正沒有料到，在他作此評估的 8 天後，德軍就打破了歐戰的假戰狀態，開始大舉進攻。其後，隨著德軍勢如破竹的進軍，蔣中正對歐局的劇變愈來愈感到震驚。5 月初，他在對一退再退的英法軍隊深懷疑慮之餘，聯想到抗日戰爭以來英法兩國對中國軍隊的嘲諷，不禁感慨地寫道，「英法往日輕視我軍作戰，尤以不能克復據點為譏評。而彼今遇德軍小數兵力不僅不能驅逐敵軍，而且不能久持，乃至不能不全部撤退。此時未知其對我國抗戰之感想如何？」³ 5 月 10 日，英國成立丘吉爾內閣，誓言將對德戰爭進行到底，但蔣中正認為，「德軍既進攻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同盟國乃不得不傾其全部資源以抵抗德國。職是之故，自難期望英法再予吾人以財政援助。時至今日，能援助中國繼續抗戰以維護國際公法及國際秩序之尊嚴於遠東者，只美國而已。」⁴

再把眼光轉到美國時，蔣中正還是懷有較大的期待。5 月 25 日，他為美國決定擴充軍備與設防關島而振奮，稱頌此舉是對日本的最大打擊。⁵ 同

² 蔣中正，〈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五次大會開幕講話〉（1940 年 4 月 1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第 17 卷，頁 215。

³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中正日記》（手稿）（後文不再註明典藏處），1940 年 5 月 4 日。筆者註：（一）在某些人名、地名的標記上，《蔣中正日記》與我們現在約定俗成的用法有所不同。為保留日記的原貌，本文在引用原文時一概不加變更，電報等其他史料亦如此處理；（二）胡佛研究所所藏《蔣中正日記》因為是手稿，文字上難免有不通順甚至錯、漏之處，但一般不影響讀者的理解，故本文對此也不作修正；（三）這一時期的《蔣中正日記》係寫在預先印好年月日的本子上，因此，一些內容因篇幅不夠而移寫在其他頁面。為方便讀者查找，筆者對此在括號中加以註明，如「雜錄」即表示該內容記在日記的雜錄部分。

⁴ 〈蔣中正與美國駐華大使詹森的談話〉（1940 年 5 月 15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第 3 編（1），頁 272。

⁵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5 月 25 日。

月 28 日，針對美國眾議院通過軍用原料禁運案，蔣中正寫道，「此為兩年來余時時所想念之一，今果實現，又在此大擴軍費通過之後而有此案，余不能不佩服羅總統政治手腕之偉大沉毅也。從此制倭計劃與佈置已告完妥，只待倭寇之自決矣」。⁶

總之，蔣中正雖然對 1940 年 4 月以後的歐戰局勢深感意外，但在 5 月底之前，由於他視美國為「遠東安定最大關鍵」，故對歐局可能對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還不是十分擔心，並且以為英法在歐洲失敗後，英美在遠東更會合作。⁷ 因此，5 月 31 日，他再次在日記中提到美國的擴軍案與禁運案，不無滿足地寫道，「三年來對國際所期望者至本月底方得逐漸實現，若無堅忍定力，焉能得此，可不戒懼乎」。⁸

但是，日曆翻到 6 月以後，隨著英法軍隊在德國的全面進攻中一敗塗地，歐局對中國造成的負面影響一天比一天明顯：12 日，英國對日讓步，就天津英租界問題和日本達成臨時協定，同日，日軍占領宜昌；14 日，德軍占領巴黎，3 天後，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屈服於日本的壓力，宣布將禁止向中國運輸軍需物資；20 日，日法協定簽字，滇越路停止了對中國的物資運輸；21 日，蔣中正把「鄂西戰局與安南停運之二事」稱為抗戰以來最大的「苦痛艱危」⁹。

蔣如此憂慮是有其深刻背景的。在歐戰爆發以前，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 1938 年 4 月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規定了聯合日本以外一切國際勢力的外交方針。¹⁰ 在此方針下，國民政府處理國際問題的宗旨是惟

⁶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5 月 28 日。

⁷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18 日。

⁸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5 月 31 日。

⁹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6 月 21 日。

¹⁰ 「抗戰建國綱領決議案」（1938 年 4 月 1 日）細分為五項原則：（一）本獨立自主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我國之國家與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二）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威；（三）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四）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五）否認及取消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以武力造成之一切政治組織，及其對內對外之行為。參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 76 輯（臺北：

以日本為敵，即在首重美英法蘇的同時，對德意兩國也竭力爭取。但自 1939 年 9 月歐戰爆發以後，在蔣中正的主導下，國民政府以英法「民主國陣營」必勝和德國陣營必敗為基本判斷。由此出發，蔣中正一時曾改變惟以日本為敵的方針，而極力主張中國應該為加強中英法合作而對德宣戰。在這一主張遭到多數意見的反對後，蔣雖然沒有堅持將此付諸實施，但在因對歐戰的態度上，他仍然以親英法、疏德意作為中國的政策基調。¹¹ 另外，在抗日戰略上，蔣中正在 1939 年 11 月舉行的中國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兩個同時」（中日戰爭和歐洲戰爭同時結束，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同時解決），也是以英法民主國陣營打勝歐戰為前提的。¹² 但在現在的歐洲，民主國家岌岌可危，歐戰似乎不久就要以和中方的預測截然相反的結果收場，蔣所堅持的中國國際戰略的基礎也隨之從根本上動搖了。

叁、「兩全」方針的出爐

面對如此巨大的變化，蔣中正不能不重新檢討內外方針，對多種可能做多種準備。恰在此時，自 5 月以來一直建議政府改善對德關係的駐德大使陳介，於 6 月 16 日致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電報中，陳介首先比較了德英法三國的強弱，斷定歐戰不久即會以德國的勝利收場。接著，陳介轉而分析德日關係，認為德國依然對日懷有不滿，特別是，德國在戰爭中消耗極大，故為考慮戰後復興，德國也不可能容忍日本獨占中國的資源和經濟利益。最後，陳介點明其主旨說：「此後英法實力日趨枯疲，俄方注意東歐，美亦僅足自保。歐戰一旦終結，世局必大改觀。我於此時似宜就自身地位，謀實際外交，勿為感情而忽利害，勿為過去而忽將來」，明確地提議政府轉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年），頁 341-342。

¹¹ 關於這一史實的經緯，請參見拙稿，〈國民政府對歐戰及結盟問題的應對〉，《歷史研究》，2008 年第 5 期；〈蔣介石對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反應〉，《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

¹² 詳見蔣中正，〈中國抗戰與國際形勢——說明抗戰到底的意義〉（1939 年 11 月 18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16 卷，頁 472-480。

向聯德。¹³ 張群於 6 月 18 日接電後，當即轉呈蔣中正。蔣閱此電後，於 6 月 21 日電令陳介「對德相機進行，並能擬具步驟與方法」。¹⁴ 翌日，法國對德投降，蔣中正驚嘆：「法國降德殊出意外，國際形勢又一大變，影響我抗戰前途更大也」；「本週憂患較切，思慮亦深，認為三年來以今日為最大最危之關鍵也」。¹⁵ 當日，蔣召集張群和外交部長王寵惠等商談外交，決定「除倭寇外，對第三國決以友義出之，而不敵視也」。¹⁶ 這裡的「第三國」主要是指德國。因此，這一決定的實質意義是儘速結束歐戰以來中國在對德關係上的冷淡狀態，而轉向改善對德關係。換言之，以對德政策為標誌，蔣中正處理危機的第一步措施，是重新恢復歐戰爆發前以日本為敵的外交方針，力求與歐戰的兩大陣營同時發展友好關係。

然而，此時的國民政府領導層，包括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和外交部長王寵惠等核心人物在內，很多人都因德國的連戰連捷與英法的節節敗退而產生了強烈的崇拜德國、鄙視英法的情緒，¹⁷ 特別是在法國對德投降、英國孤軍作戰以後，「英國必敗」論更成為主流意見。譬如，在 6 月 26 日舉行的外交專門委員會會議上，王寵惠總結說，「自法國對德降伏以後，英國對德戰爭所處之地位至為嚴重困難，縱使英國繼續單獨對德作戰到底，但在英方要侵入德國領土殆不可能，即要在經濟上封鎖德國亦難得相當之結果，最大限度能使英倫三島不被德國佔領即為幸事。但就此而言，亦只能認為英國不被德國侵佔較之英國戰勝德國相去尚遠」。¹⁸

針對瀰漫於政府領導層的這種偏於一端的情緒與展望，蔣中正刻意提醒大家注意事物的兩面性，並在公開場合特別強調其中對中國有利的一面。7

¹³ 「陳介大使柏林銑電」(1940 年 6 月 16 日)，〈陳介呈駐德外交情報〉，外交—國內情報資料—外交，《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662200105。

¹⁴ 「蔣中正張群 6 月 18 日函上的批示」(1940 年 6 月 21 日)，「陳介呈駐德外交情報」，《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662200105。

¹⁵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6 月 22 日。

¹⁶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6 月 22 日。

¹⁷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年)，第 2 冊，頁 288，1940 年 6 月 9 日。

¹⁸ 「外交專門委員會第 64 次會議記錄」(1940 年 6 月 26 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003/310.3。

月 1 日，中國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開幕，蔣中正在致詞中指出：歐戰劇變引起了日本僥倖投機乘火打劫的妄念，但它對國際形勢還不能不有所顧慮；蘇德協定使防共協定失效，日在外交上早已孤立；日本雖想宣布「東亞門羅主義」作南進的先聲，但無實現可能，其原因是美國的監視、德國的冷淡、蘇聯的壓力和中國抗戰對日本的制約。蔣中正還強調，歐局雖巨變，但我們必須看到在遠東有根本利害關係的美蘇兩強仍始終置身於歐局之外，維持中立地位。故對日本來說，既有中國的正面抗戰使其深陷泥淖，又有美蘇在它左右監視，使之不敢投機冒險。因此，日本難逃致命的打擊。¹⁹

7 月 2 日，在美國爭取美援的宋子文從華盛頓致電蔣中正報告說，羅斯福在與宋的午餐會上指出：英國如能支持至冬季，歐局必大變；今日中國如向日本媾和，無異投降，「其條件必與打至一兵一卒時同樣苛刻，以余地位，當然不能斷定中國應抵抗到底，但以友好立場論，媾和即失敗，中國目下離失敗尚遠」；「至中國如需要幣制及物質援助，余願盡力由先生與財政部詳商。美國需要錳砂，進出口銀行雖已滿額，但可另覓他途，至運輸路線，如緬甸路線遙遠，可由中國向美借款，向俄定貨，由西北運華，成一三角方式」。羅斯福還表示，「中美兩國始終不能離開，因彼此同樣要求和平與貿易，互相扶助，關係深切」。²⁰

羅斯福的上述意見是對蔣中正 6 月下旬所提問題的回答，故對蔣產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²¹ 在 7 月 5 日的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上，蔣檢討目前外交時，強調了以下三點：

一、六中全會時提出的「兩個同時」，是我們從前所決定的抗戰外交原則，到現在還是顛撲不破，應該堅持貫徹。

¹⁹ 詳見蔣中正，〈對五屆七中全會開會致詞〉（1940 年 7 月 1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17 卷，頁 373-379。

²⁰ 「宋子文致蔣中正電」（1940 年 7 月 2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 3 編（1），頁 94。

²¹ 6 月 23 日，蔣致電宋子文，指示其「對美總統說話要旨」為：「甲、歐戰形勢自法降德後對於遠東影響及中國抗戰甚為不利，問其對於中倭問題解決之道與和戰之意。乙、望其干涉倭寇對安南緬甸之壓迫，以阻制倭寇對南攻勢」。參見《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6 月 23 日。

二、我們以前望歐戰結束，使歐美各國眼光轉向遠東，共同解決遠東問題。現在局勢變遷，這個計畫似不能實現。但英法軍事雖敗，歐戰雖突變，對遠東仍無多大影響。因為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極有限，與遠東問題有關的主要勢力是美蘇。它們均未捲入歐戰，其在太平洋的勢力不但與前一一樣鞏固，而且五中全會所預期的美國在太平洋島嶼築港擴軍與蘇聯加強遠東國防等等，今都一一實現。尤其美國近半年所定擴軍計畫，比我預期的大 3 倍。美在太平洋各島修築軍港尤其是設防關島後，日必受大威脅，不易貿然南進。如其冒險妄動，也只有更加加劇美國的戒備和促成美日的衝突。如此，即英法失敗，遠東形勢還是不變，我抗戰外交仍可照預定目標進行。

三、歐戰是延長了，我要等歐美大國在歐戰結束或其軍備計畫完成之後再共謀解決遠東問題，時間也當然延長。但現在美蘇積極擴軍，日本要想與之競賽，是不可能的。二、三年後在美蘇擴軍計畫完成之時，日本在太平洋一定不能立足。故我雖困難，而敵之痛苦大我幾倍，世上沒有一國是他真正朋友。以後無論英法與國際如何變化，對日本只有增加危險。

在對國際形勢作出上述分析後，關於對德關係，蔣中正認為，因目前歐戰結果，德國地位益增重要，故中國在可能範圍內要盡力增進中德友誼。但他同時以下述三點理由強調中國在對德關係上「不必強求速效」：其一，德國本身勢必要與中國接近；其二，由於目前海運遭封鎖陸運無通路，中德即使接近也不能獲得多少物資利益；其三，德國對遠東的關係重在經濟與物資，其對外交與政治則關心較少。最後，蔣中正重申，除敵國日本以外，我對各國均要敦睦邦交，今後要堅持抗戰不變，堅持九國公約不變，堅持對太平洋各國的外交方針不變，守此三不變以度過瞬息萬變的大時代。²²

蔣中正的講話說明，雖然他基於對德國地位上升和中方「惟以日本為敵」方針的考量，提出了改善和加強中德關係的新主張，但在整體上，出於對美國因素和大局發展的信念，他仍然堅持對英美法的既定路線，並以此作為改善對德關係的前提。

²² 詳見蔣中正，〈目前外交之一般檢討〉（1940年7月5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7卷，頁382-385。

蔣中正的這些意見和前述那種瀰漫於國民政府領導層的偏於一端的情緒有根本性的區別。在蔣的引導下，7月6日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就「國際形勢劇變中之外交方針」作出了以下決定：

- 一、除日本為我唯一之敵外，對於其他國家均本多交友、少樹敵之義，並聯合在太平洋關係密切之國家，維護九國公約之尊嚴，安定太平洋之局勢。
- 二、現歐洲局勢突變，敵人妄圖利用此機獨霸東亞，然美蘇超然於歐戰之外，我當本一貫方針加緊努力，增進相互合作，對於英法盡力維持固有之關係，對德意等國不僅以維持現存友誼為滿足，更宜積極改善邦交以孤敵勢並破敵陰謀，有裨我抗戰建國之前途。
- 三、外交當局對變動中之國際形勢應密切注視，不限於消極行動以維持現狀，而尤當積極力圖改善，以適應大勢。對駐外使領館，應力求充實。²³

可以說，這個決定既高度重視改善對德關係，又在總體上兼顧了兩個方面。換言之，在蔣中正的主導下，七中全會所通過的外交方針，主旨是在對外關係上恢復歐戰前那種力求在日本以外的各個陣營中兩全其美的做法。作為貫徹這一「兩全」方針的策略原則，蔣中正在7月10日強調：「對德外交進行以經濟與軍學文化入手而不用正面外交，亦不必積極，以免英美蘇俄之顧慮」。²⁴

肆、制止兩種「一邊倒」

但是，在七中全會的「兩全」方針出爐後，圍繞中國的危機仍在繼續加深：7月12日，英國為了集中全力抗擊德國，在遠東進一步向日本退讓，

²³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80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79年），頁56-57。

²⁴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年7月10日。

竟由其駐日大使出面宣布：為因應日方要求，英國將關閉中國運輸抗日物資的重要通道滇緬路三個月。英國的這一行為對剛剛通過新方針的中國當局造成了新的巨大衝擊。13 日，蔣中正驚嘆，「自七月至九月，此三個月間實為最嚴重之時期，而以國際變態與社會心理二者之關係最大也！」²⁵ 翌日，英屬新加坡代理總督在廣播中稱：中日兩國皆為英國之友，英國今日惟一之敵人為德國之希特勒，其他各事已不能為英國所顧及。因此，即使英方避免延長遠東戰事的努力失敗，英國也只能放下一切理想以及以往之互助合作諾言，惟對德作殊死決戰而已。蔣中正在日記中摘錄了這段內容後，憤憤批判說：此廣播「完全為偏袒倭寇且藉此以委卸其滇緬路運輸停止之責任。英國老奸狡獪，無信違法，只顧其本身利害而毫無公理與公法可言」。²⁶ 在這種認識下，蔣中正於 15 日召集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王世杰、外交部長王寵惠、軍令部長徐永昌等人討論對英方針時，主張立即對英抗議，並在抗議文中一定要表明「英國此等態度直等於幫助敵人，我將有相當對待」。後經王世杰、王寵惠勸說，蔣才同意將自己的上述意思改為由駐英大使以口頭表示之。²⁷ 16 日正午，蔣中正在防空室擬定對英聲明書，並致電宋子文，令其將英國停止滇緬路運輸造成的後果轉告美國。²⁸ 是晚，國民政府正式對英國發出抗議聲明。²⁹

但是，英國在中方的抗議聲中仍然決定從 7 月 18 日起關閉滇緬路 3 個月。這一舉動極大地刺激了國民政府內外的反英情緒。它和前述那種由德國的赫赫戰績所帶來的崇德氛圍相結合，在國民政府領導層中掀起了一股主張棄英聯德的浪潮。其領頭者是時任立法院長的孫科。在 7 月 18 日舉行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三十六次常務會議上，他劈頭就發言說：

我國外交政策日趨困境，似不能再以不變應萬變之方法應付危

²⁵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13 日。

²⁶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14 日。

²⁷ 《王世杰日記》，第 2 冊，頁 308，1940 年 7 月 15 日；徐永昌，《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年），第 5 冊，頁 366，1940 年 7 月 15 日。

²⁸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16 日。

²⁹ 《王世杰日記》，第 2 冊，頁 309，1940 年 7 月 16 日。

局。因法既屈服，英又將失敗，英果敗，美為保持西半球，亦無餘力他顧，勢必退出太平洋，放棄遠東。我之外交路線，昔為英美法蘇。現在英美法方面均已無能為力，蘇雖友好，尚不密切。今後外交應以利害關係一變而為親蘇聯德，再進而謀取與意友好之工作，務必徹底進行。英法既幫助敵人中斷我之運輸線，妨害中國抗戰，在英停止緬甸運輸實施之日，應即召回我駐英駐法大使，同時宣告退出國聯，藉以對美表示民主國家辜負中國使中國迫於生存改走他道。³⁰

孫科的主張明顯地逾越了前引蔣中正講話和七中全會決議「惟以日本為敵」的精神，在對外關係上走到了拋棄英美法、單純倒向德意蘇的極端。但是，在他講話後，只有吳稚暉表示異議，其他發言者幾乎人人贊成。據會議留下的記錄，鄧家彥說：「親蘇聯德極端贊同，不悉蘇方近來對我真意如何，如有親密合作之可能，不妨與之進一步訂結軍事協定，而西北之國際運輸或更可發展」。張厲生說：「親蘇聯德應研究如何進行，希望徹底檢討，獲得共同意見，作一決定貢獻委員長採納或修正。一經裁定，大家須絕對服從一致奉行。」居正說：「親蘇自屬必要，惟召回駐英駐法大使及退出國聯亦宜趕速進行。應即請示委員長決定」。主持會議的代主席孔祥熙說，「我國外交政策現在應予檢討，改走有利途徑。英對我關稅及天津存銀等問題處處出賣，中國當不能再事虛與委蛇。德國軍人尤其國防部中人有許多做過我國顧問，對我頗有好感，要做聯絡工作似亦不難。德英戰事英雖不屈服，恐亦難免失敗」。秘書長張群說，「我外交政策，對美蘇加緊合作，對德義積極改進邦交，對英法維持現狀。此七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內所決定之對外交政策。現英日妥協，停止緬甸運輸。我對英態度應重新考慮，但不必視為變更政策。所謂不變應萬變者，係歐戰初起時總裁之表示。所謂不變之意義應釋為：(一) 抗戰國策不變；(二) 多求國際友誼合作之方策不變；(三) 擁護九國公約之態度不變。並非一切都不變。至於外交，技術上自應隨時改進」。³¹

³⁰ 「國防最高委員會第 36 次常務會議記錄」(1940 年 7 月 18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影印，《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記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 年)，第 2 冊，頁 476。

³¹ 「國防最高委員會第 36 次常務會議記錄」，收入《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記

在孫科提案成為會議主流意見的情況下，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決定將其交給因事缺席的最高決策者蔣中正最後拍板。蔣是什麼想法呢？從他的親筆日記來看，他當時對英國的做法也是義憤填膺的。7月18日，他寫道：緬甸停運，英美對遠東政策不能一致之弱點暴露無遺，倭寇乃更為所欲為。美國在遠東不能與英合作制倭，亦於此益顯。往日以為英法在歐失敗則英美在遠東更應合作之見解完全錯誤。³² 但是，儘管對英國充滿憤怒，蔣中正在7月20日舉行的商討外交政策的高層會議上，還是「不主張召回我駐英大使，亦不主張退出國聯」。³³ 根據蔣本人及相關知情者的記錄，蔣否決孫科及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多數意見的理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第一，宋子文來電，謂美國政府願貸款於我向蘇俄購軍械，或售軍械於我，經海參威運華；第二，前之反德太過與今之親德太急皆不合理；第三，國際大勢莫測，當暫處靜觀，以待其定，再決方針，猶未為晚；第四，國聯辦事處撤銷，等於已無形中脫退國聯，故此正式退盟反為其他國家所輕視，而且對國際並不發生作用；第五，因德大勝而更求其交好，徒自為人鄙視，且此時對德關係決不可能以強求而得。³⁴

蔣中正的最後決策是堅持七中全會決定，在維持英美法路線的基礎上加強對德關係。³⁵ 孫科及其贊同者反對剛剛出爐的兩全方針、主張「親蘇聯德」一邊倒的偏向就這樣被蔣制止了。但是，當時在國民政府內部還有一種以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王世杰為代表的意見，其主旨是既反對孫科式的親蘇聯德一邊倒，又反對蔣中正式的兩全其美的做法，而主張中國向英美一邊倒。³⁶ 蔣中正對這種一邊倒的偏向也予以否定，7月下旬，他決定派桂永清赴柏林任駐德武官，以加強中德關係。8月中旬，桂永清銜命赴任。³⁷

錄》，第2冊，頁477-479。

³²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年7月18日，「雜錄」。

³³ 《王世杰日記》，1940年7月20日，第2冊，頁312。

³⁴ 《王世杰日記》，1940年7月20日，第2冊，頁312；《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年7月21日、1941年1月13日。

³⁵ 參見「佚名致胡適（代電）」（1940年8月8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59。

³⁶ 詳見《王世杰日記》，第2冊，頁316、321，1940年7月30日、8月5日等。

³⁷ 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桂永清來辭行那天的日記中寫道：「余祝其歸國時能見到德藉

總之，1940 年 7 月中旬以後，在德國大捷和英法封閉對華運輸線的大背景下，國民政府內部圍繞對德路線出現了三種意見：一種由蔣中正代言，主張在加強美蘇、維持英法的前提下改善對德關係；一種由孫科代言，主張拋棄美英法、完全親蘇聯德；一種由王世杰代言，主張單一維持美英路線而不必對德改善。從整體上看，孫科的對德主張是對英法某些行為的一種義憤，但失之於情緒化。王世杰的對德主張較具一貫性，在此期國民政府的外交決策中發揮著對孫科式偏向的牽制作用，但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亦有缺乏靈活性及說服力的一面。以兩全方針為根基的蔣中正的主張最終成為政府方針，和孫、王所代表的這兩種「一邊倒」本身內含的這些缺陷，顯然有很深的關係。

伍、關於和戰得失的再檢討

自 1939 年 9 月歐戰爆發，至 1940 年夏國際危機來臨之前，在對日媾和問題上，蔣中正一直是持反對態度的。據軍令部長徐永昌的記載，1940 年 1 月底他曾向蔣進言，「言和不礙抗戰（不敢說一句和的話便是病態，便是虛矯）」，但同年 4 月法國表示願意調解中日戰事時，蔣仍予以嚴詞拒絕。徐對蔣的這種做法很是不滿，在日記中懷疑蔣的拒絕「是否完全出於迷信？」為此，當因主張對日媾和而屢遭蔣斥責的王寵惠於 6 月 1 日託徐永昌出面向蔣再次提議「乘敵圖和之時謀和」時，徐答之「言亦無益」。³⁸ 徐的答復並非過慮。因為，6 月 4 日蔣中正再次確認，「倭閥仍在積極壓迫其王室以遲加入德意軸心造成其最後冒險之狂謀，毫無悔禍退讓之意。余必待其此後進一步冒險行動之實現，激起其國內之變亂與崩潰時，方有中倭和平之望。一面再待歐戰之發展，以促倭寇之崩潰，深信不久將來或可到來也。故此時決無

顧問。蓋我國戰後建設仍須請德藉顧問為得計也」。從中可見當時國民政府高層對德觀感之一斑。《徐永昌日記》，第 5 冊，頁 389。

³⁸ 詳見《徐永昌日記》，第 5 冊，頁 275、310、332，1940 年 1 月 31 日、4 月 16 日、6 月 1 日。

和平之可言也」。³⁹

但是，7 月以後的蔣中正日記顯示，和國際危機到來之前的上述那段時期相比，此時的蔣對媾和問題的態度已經不那麼堅定了。譬如，7 月 6 日，他一邊考慮要發函指示以個人身分保持對日接觸的張季鸞對日本的求和「應暫不理」⁴⁰，一邊又考慮應該通過張向日方轉告中國在媾和問題上的最低限度，⁴¹ 並在翌日的日記中開列了中日媾和條件的要點。⁴² 這說明，在伴隨歐局劇變而來的深刻的國際危機的衝擊之下，蔣中正在媾和問題上改變了以前那種一概拒絕的姿態。

英國封閉滇緬路，危機日臻險惡後，蔣中正在力圖以「兩全」方針多方改善對外關係的同時，在對日政策上，不得不進一步從最壞的角度評估形勢，並作因應最壞局面的準備，而關於對日和戰之利害得失的再檢討，則是其中的一個重點。在 7 月 25 日的日記中，他以「甲、英國終敗。乙、美倭三年內不致戰爭。丙、倭寇對南洋不致用武力侵略。丁、俄美亦不致近期內戰爭。戊、倭寇可專心進攻中國」為假設條件，留下了他在危機期間關於中日媾和問題的第一份比較具體的思考記錄：

一、日本急於求和之原因：「甲、中倭戰爭不結束，無論德與意皆不重視倭寇，美俄更可對其脅制，故其國際無活動運用餘地。乙、國內經濟政治皆不能整個改革。丙、民心與軍心厭戰。丁、人力缺乏益甚。戊、對美對俄之擴軍更無法應付。此為最大原因與困難。己、中國原料無法掠取。庚、物力人力皆受我抗戰消耗」。

二、日本對華求和之陰謀：「甲、停戰後使我內部衝突與內亂。乙、使我士氣頹喪，不敢再戰。丙、乘我內亂乘機反攻或乘機要脅，違反約言，延

³⁹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6 月 4 日，「雜錄」。

⁴⁰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6 日。

⁴¹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6 日。

⁴² 內容為：放棄北平至山海關駐兵權，提前取消漢口租界，取消內河航行權，青島與海南島完全交還，熱河先行交還，東三省問題借用港口問題東亞聯盟問題待和平完全恢復撤兵完全實行後再談，天津與上海租界定期交還等。詳見《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7 日。

不撤兵」。

三、中國對媾和應有之基本準備：「甲、重慶根據地固定，政府不遷回南京，仍駐重慶。乙、控置全國兵力之充足。丙、軍隊不即復員，作積極整訓。丁、先訂定和平必要之條件：子、敵宣言放棄不平等條約之特權。丑、先交還漢口租界。寅、先撤退平津至山海關駐兵。卯、限期取消內河航行權。辰、限期取消津滬租界。巳、尊重海關自主，撤銷洋員。午、先交還熱河。未、瓊州青島與撤兵同時交還。申、如期撤兵，以三個月撤完。酉、恢復經常外交。戌、重訂互惠及平等互不侵犯條約。亥、解決東北問題」。

四、和戰於中國之利害：「甲、內部與中共變亂乎？乙、軍心與民心弛懈乎？丙、倭寇違約，遷延時日乎？丁、倭寇乘隙復仇反攻。此害也」。「子、倭受我此次抗戰教訓，不敢再侵華。丑、倭對美俄軍備競爭，不遑侵華。寅、開放封鎖，我可購入機器與利用外資。卯、我可休養生息，從事建設，重整國防。辰、我可專心統一，從事復興，實現主義。巳、美國擴軍案已通過實行，此後倭必不能對華安心侵略矣。此利也。」

接著，蔣中正還設想中國的建國與獨立可以分幾步完成，即：「此次抗戰目的惟在打破倭寇亡華之傳統政策及其侮華之自大心理。至於根本取消不平等條約，求得完全獨立，則在戰後之自強自立，而於十年以內倭美、倭俄或德俄戰爭時期我國乃能獲得真正獨立自由之機」。⁴³

7月30日，蔣中正進一步確信，「自7月起以後3個月期內實為我國抗戰最大之難關，須準備一切」，在「歐戰激變、英法失敗、美俄對我之艱難皆袖手旁觀置之不理，安南與緬甸交通皆斷絕，以後外交、經濟、交通皆必困難益甚」的狀況下，「我之政略與戰略皆應重新研討，以求得至當，事事應以自求自救為第一義也」。⁴⁴ 不言而喻，對此時的蔣中正來說，中日媾和當然也是「自求自救」的選項之一。⁴⁵ 恰在此時，日本也通過和知鷹二等

⁴³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年7月25日，「雜錄」。

⁴⁴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年7月30日（筆者註：此段日記寫在6月30日頁後的「本月反省錄」的空白處，但蔣特註明寫於7月30日）。

⁴⁵ 參見公安部檔案室編註，《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年），頁146，1940年8月5日。

多種渠道加強對國民政府的誘和工作，包括託人向蔣中正遞送表示誠意與敬意的信件，其內容甚至被蔣視為「無異乞降」。⁴⁶ 在這樣的背景下，8 月 4 日，蔣中正認為「趁敵南進野心猖狂之時，謀於我有利條件下之媾和，未始非計也」⁴⁷，遂命張季鸞出面與日方接觸，開始媾和試探。

如何看待蔣中正的這一決策呢？筆者認為，除了首先要承認它本身也屬於危機處理的一種措施以外，還必須結合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事實而加以全面的分析：

第一、蔣中正所設定的媾和條件。8 月 4 日後，在蔣的主導下，張群、陳布雷、張季鸞等人開始起草關於媾和條件的文件。同月下旬，這份題為「處理敵我關係之基本綱領」的文件定稿。其中規定：抗戰的最大之成功為完全戰勝，收回被占領、掠奪之一切，不惟廓清關內，並收復東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則為收復七七事變以來被占領之土地，恢復東北失地以外全國行政之完整，而東北問題另案解決之。以上兩義，前者戰勝之表現，後者則為勝敗不分，以媾和為利益時之絕對要求。文件還規定：和議之發起必須出之敵方，其條件必須無背於我建國原則，而足以達到我最小限之成功，貫徹我最小限作戰目的，是時始允其開始和平之交涉。⁴⁸

從這些內容來看，經蔣肯定的最小限度媾和條件擬將東北問題另案解決，很不澈底，但和蔣在 1939 年 1 月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對抗戰目標的設定（「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事態」）相比，應該說並無降低。⁴⁹ 而就另一方面來說，蔣在同年 11 月舉行的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上，出於對歐

⁴⁶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8 月 10 日。

⁴⁷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8 月 4 日。

⁴⁸ 「處理敵我關係之基本綱領」，〈和平醞釀〉（四），特交檔案—分類資料—中日戰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3030002。

⁴⁹ 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把抗戰之「底」即對日目標秘密確定為「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事態」。由於這個目標可以被解釋為默認包括「滿洲國」在內的盧溝橋事變前的既成事實，在翌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與會者就此提出質疑，但蔣只是稱抗戰目標不宜明示，而仍迴避言及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的事態。結果，國民參政會只得決議僅提「抗戰到底」，而不明示目標。參見《王世杰日記》，第 2 冊，頁 35-36，1939 年 2 月 17、18 日；「翁文灝致胡適電」（1939 年 2 月 7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頁 12。

戰局勢的期待，已把中國的抗戰之「底」從「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事態」，抬高為前文提到的「兩個同時」⁵⁰，因此，現在的 8 月「綱領」讓最小限度媾和條件重新回到蔣在 1939 年 1 月的設定，則可謂是因應歐戰負面影響的一種後退。

第二，蔣中正在媾和問題上的心態。史料顯示，在決定由張季鸞試行和談的過程中，蔣中正的內心一直是很掙扎的。8 月 29 日，他「告季鸞布雷對條件不可遷就與交涉時堅持之態度以及談話各要點以壯其氣」⁵¹，似乎已決心開始和談。但同日，他又認為中國對日是否媾和，應取決於以下因素：一、10 月以後英德戰局如何？滇緬路能否開放？二、敵國近衛新政治體制至明年 1 月底能否如常進行，德倭以後之關係如何，能否同盟？三、美國 11 月大選後對遠東之政策如何？四、中共抗戰之態度與行動如何？五、德俄在東歐形勢變化如何？六、我國之實力及內容環境如何？七、敵軍是否南進，其精神與實力如何？⁵² 到了 8 月 31 日，蔣中正更對媾和的合理性產生懷疑，在日記中說，「敵倭時時以『日滿支』名詞為對象，如何而望其徹悟與和平？我國損害傷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輕易議和？」因此，同日他電告張季鸞，「我以延宕時間為主旨」。但同時他又決定「敵果誠意求和，我有一定限度。能到預期程度，雖有內外各種阻礙，亦當言和。」⁵³ 9 月 5 日，當徐永昌以「抗戰愈久共勢愈張」及德國亦盼中日停戰為由再次向蔣提議對日謀和時，蔣回答說，「日已無力，停戰後亦無大作為」。⁵⁴ 7 日，蔣乾脆命陳布雷通知張季鸞離港返渝。由於張沒有完全服從蔣的指示，蔣還在 9 月 22 日批評張季鸞等「無方而好事」。⁵⁵ 然而，另一方面，蔣最終確定停止對日

⁵⁰ 詳見前揭蔣中正，〈中國抗戰與國際形勢——說明抗戰到底的意義〉（1939 年 11 月 18 日）。

⁵¹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8 月 29 日。

⁵²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8 月 29 日（筆者註：補錄於 9 月反省錄之後）。

⁵³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8 月 31 日。

⁵⁴ 《徐永昌日記》，1940 年 9 月 5 日，第 5 冊，頁 404。

⁵⁵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9 月 22 日。此外，關於這一時期由張季鸞出面的秘密談判，詳見楊天石，〈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收入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 1 冊。

媾和交涉，實際是在後來因日德意三國結盟而消除了中國的國際危機之後。⁵⁶

第三，蔣中正在探索對日媾和利害的同時，曾認真考慮為堅持抗日而改善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這一點有多方面的資料可作佐證。譬如，6月11日，蔣中正在審閱唐縱建議加強聯蘇的文章「國際現勢之觀察及其對策」後，簽名批示「可嘉勉」。⁵⁷ 7月21日，蔣中正在否決孫科提案的同時，在日記中寫道，「對內對外之方針應切實考慮，蘇俄道路不得行乎？」⁵⁸ 翌日，唐縱根據自己對蔣中正的觀察記道，「近來外交以越南、緬甸被封鎖為樞紐，逐漸在轉變，對蘇聯、對共黨都有新的觀念，總理三大政策勢必重新揭舉，聞朱、毛亦有電來如此要求」。⁵⁹ 7月25日，蔣中正確定，「一、對中共方針用政治解決為主。二、對蘇俄至少維持現狀不宜惡化」。⁶⁰ 8月20日，華北八路軍在正太鐵路沿線同時向日軍發起攻擊，百團大戰開始。對此，蔣中正在月底的總結中肯定其「予敵以相當之威脅」。⁶¹ 對蔣中正在蘇聯和中共問題上的這種變化，中共自己也有認識。譬如，毛澤東在 1940 年 10 月 29 日給周恩來等人的電報中指出，「在七八月間蔣介石確曾準備於重慶失守時遷都天水，準備親蘇、和共與某些政治改良」，後來由於德意日三國同盟後英美對日積極化的結果，蔣才在親蘇和共政策上又發生「動搖與大變」。⁶²

上述蔣中正在媾和問題上的心態及對聯蘇聯共的考量說明，後人在研究蔣在國際危機中的表現時，必須充分重視客觀形勢的巨大影響。

⁵⁶ 詳見拙稿，〈日独伊三国同盟をめぐる蔣介石の多角外交〉，《年報日本現代史》（日本），第 16 號（2011 年 6 月）。

⁵⁷ 公安部檔案室編註，《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0 年 6 月 11 日，頁 133。

⁵⁸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21 日。

⁵⁹ 公安部檔案室編註，《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0 年 7 月 22 日，頁 143。

⁶⁰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25 日。

⁶¹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8 月 31 日。

⁶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216。

陸、支撐蔣所作抉擇的兩大關鍵

以上以對德政策與對日政策為中心，考察了蔣中正在國際危機時期的政策抉擇。蔣之所以做出這些抉擇，原因當然是很多的。但從整體上看，對日本政策走向的觀察與對德蘇英美相互關係發展趨勢的展望，是支撐蔣中正所作政策抉擇的兩大關鍵。以下分別概述之。

一、對日本政策走向的觀察

自 1939 年 11 月確定以「兩個同時」為對日新戰略後，蔣中正對日本是否南進特別關注。因為他認為，日本的南進雖然有截斷中國的物資通道，給中國造成危害的一面，但從長遠與全面的結果來看，日本的南進對中國來說是利大於害。危機前夕的 1940 年 5 月 25 日，蔣中正再次強調了這一觀點，稱「倭如南進則其必介入歐戰並與美衝突，於我政略上為有利也」。⁶³ 27 日，他又寫道，「倭如佔領南洋英法屬地則其必與英法為敵，此余之所大欲。余必加入英美法方面參戰，則最終目的仍可達到」。⁶⁴ 蔣中正當然明白，中國不可能左右日本的政策走向，日本的國策根本上只有日本自身才能選擇。但他同時認為日本決策者已失去理性，故必然走上自殺之路。因此，7 月 1 日蔣中正斷定，「倭軍部又干涉其政府外交政策，且甚激烈，逼其政府南進，此必為敵國之致命傷也」。⁶⁵ 顯然，在歐局帶來的國際危機中，蔣中正把日本的南進視作中國最終轉危為安的一個機會。因此，當日本此期醞釀改組政府，由近衛文麿取代米內光政組閣之際，蔣中正十分關心政府更迭後的日本將採取何種外交政策。經過觀察與思考，7 月 16 日，蔣預測，「敵米內內閣辭職，如其後任為近衛，則其侵華或將更積極」。⁶⁶ 翌日，他判斷，「近衛出馬，其對南洋與侵華皆將取軍部積極政策，此非於我不利也。惟戰事必更

⁶³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5 月 25 日。

⁶⁴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5 月 27 日。

⁶⁵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1 日。

⁶⁶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16 日。

延長。吾人更應從根本做起，不患不能復興。禍兮福所倚。」⁶⁷ 7 月 22 日，近衛內閣正式登台，蔣中正在「專研究倭閣新組後形勢與政策」後認為，近衛「愛惜毛羽，既好虛名，又無決斷，八面討好，既無中心思想，又無鬥爭經驗，更無貫徹到底之毅力，故在其前任內閣徒唱國民再組織，最近又唱新政府體制，以來，仍無定見，無進步」。⁶⁸ 翌日，在細讀剛剛公布的近衛內閣名單後，蔣斷定「此次內閣可謂最幼稚最無人望之內閣」。

關於以後日本對國際的動向，蔣中正從多種可能性予以分析，說：「如英倫果為德國在三個月內占領，則倭將要求德國諒解而參戰，而負責占領新加坡與英屬南洋，以斷英國之後。否則彼或聯合英美以抗德俄，此亦不無可能也。如果英倫失陷，倭攻遠東之英屬及其海軍，則美國未必能袖手傍觀。然本年 11 月以前美國大選未定之前，美或不能以實力助英，亦未可知。如此，則遠東危險，近衛或有死灰復燃之機，故在此三個月內甚願天祐英國，能使之固守，英倫不失，俾世界與遠東局勢得以轉危為安。然此為人類禍福所關，冥冥之中必有主宰，吾人只可盡其人事而已，雖憂何益？若倭攻遠東之英國，則英必求助於我，則於我未始不利。」⁶⁹ 7 月 26 日，針對日本的南進動向，美國宣布對石油與廢鐵的對日出口實行限制，蔣中正從中備受鼓舞，稱「美國對倭禁運汽油與廢鐵昨始宣布，此舉雖晚，然亡羊補牢，仍於我有效益也」。⁷⁰

此後，在日本南進動向與美國制日行動的交相作用中，蔣中正判斷：近衛內閣登台後，日本陸海軍之意見必更衝突（7 月 31 日日記），近衛內閣將促敵國內外崩潰（8 月 2 日日記），英美在太平洋上似有合作趨勢，以阻止倭寇南侵，日本已將排斥白人之意畢露無遺，可知其昏愚已失理智（8 月 9 日日記）。9 月 23 日，日軍侵占法屬越南北部，蔣中正高興地稱，「此為敵國侵略行動由華轉移其他國家之開始，亦即對英美挑戰之實現，故應特別研

⁶⁷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17 日。

⁶⁸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23 日。

⁶⁹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23 日，「雜錄」。

⁷⁰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7 月 27 日。

究勿失時機。此實為我國對倭抗戰最大之轉機也」。⁷¹

二、對德蘇英美相互關係發展趨勢的展望

盧溝橋事件以後，蔣中正一直視蘇聯為中國抗日的與國，十分重視加強對蘇關係。但在 1939 年 9 月歐戰爆發特別是蘇聯先後入侵波蘭、芬蘭以後，由於蘇聯和英美法的對立，也由於蘇德關係的曖昧，以及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關係的特殊，蔣中正儘管繼續堅持以蘇聯為抗日與國，力圖利用日蘇矛盾以蘇制日，但同時加深了對蘇聯的不滿與不信。後者尤其集中於對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後的蘇德關係的警惕之中。蔣最擔心的，是蘇聯是否會利用自己微妙的中立立場，在日後世界明確分化為日德意陣線與英美法陣線以後，從兩大陣營的「火拼」中獨得漁翁之利。⁷² 因此，在歐戰因德國的進攻而開始劇變的 5 月中旬，蔣中正希望，在蘇聯未參加歐戰前，美國能「作為太平洋之安定力以監視倭俄」，而絕不在蘇聯之前先加入歐戰。⁷³ 同月下旬，蔣中正擔心：在英美法與日德意兩大陣線的對壘中，蘇聯「待此雙方疲竭時乃出而干涉，引起世界革命，推翻帝國資本主義，獨霸世界」。⁷⁴ 由此可見，對蘇聯中立策略的高度警戒，是其後蔣中正主導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通過前述「兩全」方針的一個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在危機到來以後，蔣更加關注蘇聯的取向及德蘇英美關係的發展趨勢。8 月 2 日，在回顧前月國際形勢的演變時，蔣已經看到，「德俄在巴爾幹爭霸之行跡顯露」，「德無積極攻英之企圖或有言和之可能」。⁷⁵ 同月 16 日，蔣分析說，「英德決戰，如德能速勝則德俄戰爭或接踵而起，俄必專力於西方。如此，德倭意防共協定或將復活，則英美蘇或又成一線亦未可知。若德不能速勝英國，曠日持久，則俄待倭南侵以後，其必向巴爾幹及近

⁷¹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9 月 23 日。

⁷²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4 月 20 日。

⁷³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5 月 18 日。另外，從後來的蔣日記來看，蔣的這一觀點一直持續到 1941 年 6 月蘇德戰爭爆發為止。

⁷⁴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5 月 27 日，「雜錄」。

⁷⁵ 《蔣中正日記》（手稿），7 月，「反省錄」（筆者注：記於 1940 年 8 月 2 日）。

東奪取英德勢力以制德矣。如此俄仍不能兼顧遠東制倭也。」⁷⁶ 翌日，他分析說，「德勝，如德俄衝突不急發動，則德仍不欲聯倭，亦不願讓遠東荷法殖民地於倭也。英國如能持久，則英美將在太平洋上聯合對倭，則倭對安南與荷印仍不能侵略。若德勝，德俄戰爭即起，則德將以南洋權益許倭，而倭侵入越南，是時英美或亦不敢抗倭，此則於我最不利也。然此種公算不大耳。如我能堅持至本年杪或明春三月，則抗戰未有不成也」。⁷⁷ 8 月 31 日蔣說，「英德本月空戰未分勝負，歐戰或將延長，德俄在東歐爭霸日顯，俄倭開始實行勘劃滿蒙邊界，英美對倭抗議變更安南現狀，多於倭不利乎」。「英德決戰之結果：甲、如德國果占領英倫三島，英國失敗時，英德如繼續作戰不能言和時，則以後對遠東與倭國之影響不出三途：子、德與英蘇對倭國皆不即不離，一如現狀。丑、德與倭合作或同盟，倭對英美宣戰。寅、倭與英美妥協，對德意中立。此為德既敗英，無需與倭合作時之局勢，或亦有可能。乙、如英德決戰後媾和，則為中國之利亦即全世界之利也。否則，德與俄在近東爭霸，德意倭成為一戰線，英美蘇亦成一戰線，此我中國之所期也。」⁷⁸ 進入 9 月後，隨著蘇德之間在羅馬尼亞等問題上的對立日益明顯，蔣中正愈來愈判斷「德俄裂痕日深，美俄有接近之可能。」⁷⁹ 從蔣中正以德蘇爭霸、日德意與英美蘇各為盟國為中國之利的觀點來說，危機時期他對德蘇英美關係發展趨勢的這些比較有遠見的觀察，顯然對他的危機處理產生了積極作用。

柒、結語

在結束本文的論述時，筆者擬以下述四點作為對全文的總結：

第一，在 1940 年夏季的國際危機中，世界大局變幻莫測，歐戰與中國的抗戰前景都似乎是黑暗壓倒光明。身處這種困難而複雜的狀況，如何認識

⁷⁶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8 月 16 日。

⁷⁷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8 月 17 日。

⁷⁸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8 月 31 日。

⁷⁹ 《蔣中正日記》（手稿），1940 年 9 月 16 日。

現實？如何展望將來？如何選擇政策？對蔣中正是一場嚴峻的考驗。他在這一考驗中的所作出的抉擇，可概括為幾個要點：（一）整體：惟以日本為敵，制止兩種一邊倒，力求與日本以外的所有國家都加強友好；（二）對德：結束歐戰爆發以來的疏遠狀態，力求在維持英美關係的前提下獲得改善；（三）對日：檢討和戰的利害得失，設定最高與最低媾和條件，並在至少確保最低條件下試探媾和的可能性；（四）對歐戰及相關國家：克服國民政府領導層中出現的偏激情緒與極端意見，同時看到多種可能性，並相應準備多種因應措施。蔣中正後來認為，他在危機時刻的這些抉擇（特別是制止孫科的主張），是他在 1940 年作出的最具關鍵意義的決定。⁸⁰ 國民政府中知道這段內情的人物，也在事後為此深深慶幸。⁸¹

第二，在影響蔣中正所作抉擇的各種因素中，對日本政策走向的觀察和對德蘇英美相互關係發展趨勢的展望，具有關鍵的影響。在此二者中所反映出來的蔣中正的哲學思辨，特別是關於事物變化發展的辯證法的思考，表現出蔣中正此期不同於其他領導人的認識特點，即較多地注意到多種可能性，而非固執於一種可能性；較多地注意到事物的複雜性與變化性，而較少簡單化，較少固定化。這種哲學思辨的引導，顯然在蔣的抉擇過程中發揮了正面的作用。

第三，危機時期，國民政府內部圍繞對德路線出現了三種意見。其中，蔣中正與孫科的分歧不在於應否聯德，而在於在何種前提下聯德。孫科主張

⁸⁰ 1941 年 1 月 13 日，蔣中正在總結過去一年的內政外交時，特地提到危機關頭在對德方針上與孫科等人的爭論，稱：「當時若無定力與遠識，如果為一時利害所惑，遷美聯德，則英美今日不僅不願與我合作且其必聯倭以害我，而我乃反處於今日倭國大不利之地位矣。今思追往，據此一端頗足自慰也」。《蔣中正日記》（手稿），1941 年 1 月 13 日。

⁸¹ 1940 年 9 月 27 日日德意三國同盟成立後，圍繞中國的國際形勢轉危為安，10 月 18 日，滇緬路重新開放。19 日，王子壯見到三個月前因自己的棄英聯德主張被蔣拒絕而負氣出走香港的孫科重返重慶。是夜，王在日記中感慨地寫道：「假使如孫先生之主張，今日之中國仍完全孤立於世界。甚矣。柄國是者須鎮靜處事，是蔣先生之鎮定有以致之。絕不能以衝動之意氣處理國家大事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子壯日記》，第 6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頁 293。

脫離英美，單純親蘇聯德（一邊倒）；蔣中正則主張在加強美蘇關係、維持英法關係的前提下聯德（兩全其美）。如果從主張另一種一邊倒即對英美一邊倒的王世杰式的角度來看，蔣的兩全方針容易被視作具有投機性與動搖性。但若考慮到危機時刻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特別是考慮到當時美蘇兩國也在自稱中立及中國共產黨也在堅決反對「加入英美集團」的客觀情況，後人就須對所謂投機性與動搖性作出全面的分析，而不能予以簡單的否定。

第四，同時應該指出，蔣中正在危機時期雖然看到了多種可能性，從而表現出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但在當時的客觀條件的限制下，他對哪一種是主要的可能性，哪一種是次要的可能性，還未能完全看清；在對歐戰最終勝負及蘇聯今後取向的判斷上，他不像多數人那樣悲觀，但也不是很有把握。所以，蔣中正在此期的外交上，總的出發點是維持現狀，靜觀發展，等三個月後局勢明朗化再做最終決斷。也就是說，蔣中正雖然沒有像孫科或王世杰那樣偏於一個極端，但總體上是在兩個極端的中間觀望和等待。而最後結束蔣中正的觀望和等待的，則是 1940 年 9 月日德意三國同盟成立後所出現的有利於中國抗戰的國際新局面。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將在另一論文中再作詳細論述。⁸²

⁸² 詳見拙稿，〈日独伊三国同盟をめぐる蔣介石の多角外交〉，《年報日本現代史》（日本），第 16 號（2011 年 6 月）。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影印，《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記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 年。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 76 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年。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 80 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79 年。
-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
- 國防 003/310.3，〈外交專門委員會會議記錄〉。
-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 0010662200105，〈陳介呈駐德外交情報〉，外交—國內情報資料—外交。
- 《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002080103030002，〈和平醞釀〉（四），特交檔案—分類資料—中日戰爭。

二、日記、文集、年譜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公安部檔案室編註，《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 年。
-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
-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年。
-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年。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16-17 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手稿）。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三、專著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一）。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8 年。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 年。

四、期刊論文

左雙文，〈轉向聯德，還是繼續親英美？〉，《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

鹿錫俊，〈國民政府對歐戰及結盟問題的應對〉，《歷史研究》，2008 年第 5 期。

鹿錫俊，〈蔣介石對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反應〉，《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

鹿錫俊，〈日独伊三国同盟をめぐる蔣介石の多角外交〉，《年報日本現代史》（日本），第 16 號，2011 年 6 月。

